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霍乱时期的
爱情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霍乱时期的爱情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
纪晓红 译

责任编辑:戈弋 胡丽娟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远方出版社(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 362.5 字数:5400千字

2004年8月第2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ISBN 7-80595-693-6/I·273

定价:877.50元(全39卷)

前 言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的一家杂志开辟了一个新的栏目，那就是为新出版的图书排列名次。最初，仅以书的印册为标准来评定一本书的位次，后来又逐渐增加了评定的规则，如把书籍按内容分类等等。伴随着人类文明一百多年的迅猛发展，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书籍对于现代人来说也越发显得重要。阅读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于是一种旨在向人们推介新书、好书的“畅销书排行榜”便迅速发展并成熟起来。据不完全统计，现今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各类图书排行榜数以万计，具有国际影响的排行榜也有近百家，这些排行榜对文化的交流、文学的繁荣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当代西方，许多作家的名作是通过畅销书排行榜走向读者，畅销世界的。这些畅销作品，内容极为丰富，贴近生活、贴近读者，深受广大读者的青睐，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滋润着人们的精神家园。

近些年来，畅销书的热潮自大洋彼岸涌向了国内，一股强劲的“畅销书热”，方兴未艾，国外许多排行榜的榜首著作纷纷被译介到国内。为推动这一文化热潮，我们组织了国内众多知名的青年翻译家，把近几年来国外最具影响、最为畅销的新作翻译过来，辑成了《世界金榜畅销译林》一书。全书内容新潮时尚、异彩纷呈，折射了西方当代的社会生活，体现了西方人的人文思想与时代精神，给广

大的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份丰盛的文学大餐。

这些畅销作品，大多高居各家排行榜的前列，可谓“书书精彩，本本畅销”。如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就是一部美国黑手党的发展史，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全美最畅销图书，连续十二年在美国 MBA 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第一，该书全球销量突破 3000 万四大关。美国《纽约书评》评论：“激烈、紧张、刺激，是一部无以伦比的畅销书”；劳拉·特勒的《今夜我想你》在华尔街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榜 52 周，其影响波及了欧美及亚洲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当时关于它的评论文章多达三百篇，在美洲、欧洲、亚洲等地共印行了 2000 多万册，成为一部世界级的畅销书。作者劳拉·泰勒也由此而获得了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授予的“智慧的阿年丰索十世勋章”。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的出版，必将在中国掀起畅销书的热潮。

衷心感谢译者的辛勤工作和读者的关注支持。

衷心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

2001. 3



第一章

这些地方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它们已有了戴王冠的仙女莱昂德罗·迪亚斯

这是毋庸置疑的：苦扁桃的气味总引起他对情场失意的结局的回忆。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刚走进那个似明似暗的房间就领悟到了这一点。他行色匆匆地赶到那儿本来是为了进行急救，但是那件多年以来始终使他难以忘怀的事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那位安的列斯群岛的流亡者、残废军人、儿童摄影师，同时又是跟医生交情深厚的国际象棋对手德萨因特·阿莫乌尔，此时已利用氰化金挥发出来的气体，彻底从回忆的苦难中解脱了。

▼ 霍乱时期的爱情

医生看到尸体躺在行军床上，上面覆盖着一条毛毯。阿莫乌尔平时向来是睡在这行军床上的。靠近行军床有个板凳一只小桶放在上面，它是用来蒸发毒品的。地板上躺着一只胸部雪白的黑色丹麦大狗，它被捆绑在行军床的床腿上，旁边放着一根拐杖。那间让人喘不过气来的乱七八糟的房间，既是卧室又充当工作室，黎明时的曙光从开着的窗户射进来，微微的光亮已足以使人们立刻认出他肯定已经死了。其它的窗户以及门缝都被破布盖得丝丝入扣或用黑色的马粪纸掩盖起来，这就更增添了房间内的压抑的气氛。一张木台放在房里，上面摆满了细口小瓶和没有商标的香水瓶。在用红纸盖着的一台普通聚光灯下还有两只白蜡小桶，外皮已经脱落。第三只桶里装着定影剂，靠近尸体。已过期的报章杂志扔得满



地都是，一块块玻璃板上摆满底片，破烂的家具摆得乱七八糟，但是在那双勤快的双手的劳动下，一切都显得干干净净。即使从窗外吹来的空气使室内气味变得清爽，但深谙内情的人，依然可以感觉到那带有苦扁桃气味的不幸的爱情的怨恨和伤痛。乌尔比诺曾多次地在没有先机的情况下想过：那里真不是应上帝的感召而永别人世的合适场所。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终于领悟到，死者的神经失调或许正是出于上帝的一种密旨。

警察局长带着一个正在市诊所里进行法医实习的年轻学生抢先一步到达了，也是他们在乌尔比诺医生到来之前打开了窗户，并且用东西盖住了尸体。局长和学生面无笑容地跟医生打了个招呼，医生这次之所以到来，主要是由于同情，而不是由于受人尊敬，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和阿莫乌尔的友谊之深厚。这位医术高超的教授，就像每天在临床课开始之前跟他的学生分别握手一样，同警察局长和年轻的实习生握了握手，然后就用食指和拇指紧紧拉住毛毯的边缘，好像对待一朵鲜花，像平常一样慢慢谨慎地揭开了毯子。赤裸的尸体僵硬地蜷曲着，眼睛睁着，皮肤呈蓝色，好像比前一天晚上老了五十岁。他的瞳孔是清彻的，而胡子和头发是金色的。腹部上有一道旧伤痕，随便地缝合着。因为拐杖的折磨，他的身躯和胳膊好像被判服划船苦役的犯人那样粗大健壮，然而他的僵死的双腿却似孤独无靠的孤儿的细腿。乌尔比诺医生带着悲痛的心清注视着，他在同死神生死拼搏的漫长岁月里，绝少有这种表情。

“真笨，终于发生了这件倒霉的事情。”

他用毛毯再把尸体盖上，恢复了孤高傲岸的教授的神气。前年他过八十寿辰时，热闹非凡地庆祝了三天，在致辞时，他再次顶住了退休的诱惑。他说：“我死后总会有足够的时间休息，但死亡这件变化莫测的事还没有列入我的考虑范围。”他右耳越来越衰弱了，他用带银柄的拐杖来掩饰蹒跚的步履，依然显示年轻时的气派，身



穿一套亚麻布衣服，加披一件坎肩，坎肩上挂着金表链。珍珠母色的巴斯德式的胡须和同样颜色的梳理得油光发亮且中分的头发，是他性格的真实再现。记忆衰退越来越使他感到不安，他不得不随时随刻把事情记在小纸条上，以免疏漏。结果，口袋里的小纸条多不胜数，又杂乱无章分辨不出，如同医疗器械、药瓶以及其它东西在他装得满满的手提箱里混成一团一样。他不仅是城里资格最老和医术最杰出的医生，也是穿着最讲究的绅士。但是，他的锋芒毕露的智慧和不太谦虚地动用权威的方式，经常使他得不到本来应有的爱戴和尊敬。

他给警察局长和实习生下的指示是迅速且准确的，用不着验尸。房间里弥漫的气味就足以证明死因：某种感光的酸液造成了容器内的活性氰化物的挥发。可是死者阿莫乌尔本人是精熟此道的，根本不可能在这种事情上出现意外。看到警察局长的半信半疑的表情，乌尔比诺以他特有的处事方式有力地打断了他的话：“勿必牵记，签发死亡证明的人是我！”年轻的医生也觉得没劲：他从来没有碰到过通过解剖尸体来研究氰化金特质的机会。乌尔比诺医生很诧异，在医学院里从没见过这个学生，然而从他羞涩的表情的安第斯发音上很快就知道了：也许是他才到城里。他说：“在这里，不出几天，就会有某个爱情疯子给您一个机会。”这句话刚出口，他便立刻想别到，在他记忆中数不胜数的用氰化物自尽的人中间，这还是第一个并不是因为爱情而自杀的人。随即他稍稍改变了他的嗓门：

“当你遇到这种事时，请好好留意。”他对实习生说，“在心里往往可以找到金属的微粒。”

接着他像上级对下属那样与警察局长谈话，指示他要避开一切审理手续，以便当天下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举行葬礼。他说：“从今以后我会去找市长谈。”他晓得阿莫乌尔是个十分节约的人，俭

朴得像个原始人，他靠自己的手艺挣来的钱足以维持生活，此以，在他的某个抽屉里应该有存款，用做葬礼是充足的。

“但是，找不到也没事。”他说，“一切花费由我承担。”

虽然他知道报界对这一消息决不会感兴趣，他依旧叮嘱了记者：摄影师是自然死亡。他说：“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找省长谈的。”警察局长是个严肃而谦虚的公职人员，他早就听说过乌尔比诺医生的严肃认真甚至可以使他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接受。他对他那么轻松地避开一切法律手续匆忙安排葬礼感到吃惊。警察局长仅有的一个不同意的是去和主教谈判，把阿莫乌尔埋在圣地。他对自己的不肯帮忙的态度感到歉疚，请求医生谅解。

“我知道他是圣人。”他说。

“不但是个圣者，而且有点古怪。”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个无神论的圣者，但那是上帝的意旨。”

在殖民城市的另一端，大教堂的钟声遥远地传来了，召集人们去做大弥撒。乌尔比诺医生戴上半月形夹鼻金丝眼镜，拿出一块精致的方形怀表瞧了瞧，表盖在弹簧的作用下轻轻弹开弹簧把表盖轻轻地打开了：他差点儿耽误了圣灵降临节的弥撒。

客厅里，一架巨型照相机摆在轮子上，那轮子就同公共场所活动栏杆下的轮子一样。幕布上画着“黄昏的大海”，显然是工匠的杰作。其它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照片，并写上那些带有纪念意义的日期：第一次圣餐、戴兔子假面具、幸福的生日。乌尔比诺医生借他到这里来下棋的那些下午，一年又一年地，于苦苦思索之余，亲眼目睹了这个客厅的墙壁已渐渐被照片遮挂殆尽。他曾无数次无比痛心地想到，在那个摆设着即兴拍下的照片的展室里，诞生着一个未来的城市，这座城市将由那些不可估测的孩子来治理和败坏，而他的荣誉则将消亡殆尽。

写字台上，临近一个放有几只海狼牌烟斗的陶瓷罐，设着一盘



残局。虽然他有急事要办，心情又沉闷异常，乌尔比诺医生还是不由自主地把那盘棋研究一番。他知道，那是前一天夜里下的棋，因为阿莫乌尔每天下午都是下棋，并且至少要找三个不同的对手。但是，次次他都是把棋下完，把棋盘和棋子装回到盒子里，然后把盒子放到写字台的抽屉里。他还知道，阿莫乌尔下棋时从来都是执白，而那一局棋，不出四步，白棋就肯定输了。“假如他是他杀，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他心中这样想，“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才会想出这么巧妙的杀着。”那位坚定不屈的、喜欢拼杀到最后一滴血的壮士为什么没有下完这最后的一局棋就不幸死去了？他觉得不弄明白，自己继续活下去便没有意义。

在清晨一点钟的时候，更夫在做最后一次巡逻时，看到在临街的门上竟然写着这样几个字：“不必敲门，请入内，并请通知警察。”不久，警察局长和实习生就赶到了，两人在房间里检查了一番，想要寻找苦扁桃气味的来源。但是，在分析那盘残棋的短短几分钟内，警察局长在写字台上的一些纸张中找到了一封写给乌尔比诺医生的信。信封用火漆封得严丝无缝，须得撕开封口，才能把信取出。医生拉开黑色的窗帘，让光线射进来，接着飞快地向那一页正反两面都用好的字体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扫了一眼。读完第一段之后，他就知道自己已来不及领圣灵降临节的圣餐了。他激动地喘着气阅读着，为了把零乱的思路联接起来，他反反复复读了几遍。当读完全信，他感到自己好像是从过去一个十分遥远的地方归来。纵然他想努力振作精神，还是改变不了丧气的神色。他双唇发蓝，手指颤抖着把信叠好放进坎肩的口袋里。这时，他才想起了警察局长和年轻的实习医生于是带着十分痛苦的神情向他们微笑了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说，“是他临死的一些遗言。”

这半真半假的话完全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因为他们按他的指



示揭开地板上一块活动瓷砖果然在那里出现了一本陈年旧帐，保险柜的密码就写在上面。钱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多，但是用来安葬和办理其它琐事已算是有余了。乌尔比诺医生此时赶到，在宣讲福音书之前，他已来不及赶到大教堂了。

“自从我记事以来，这是我第三次误了星期日弥撒。”他说，“但是，上帝会谅解。”

这样，他宁可多耽误几分钟，以便把所有细节全部解决。居然，他急不可耐地想同他的妻子共同分享信内的密秘。他宣称要通知数量巨大的住在城里的加勒比海难民来判断他们是否愿意向这位最受尊敬、最积极和最激进的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他显然已经向困难屈服，没有赶走他前进路上的拦路虎。他也将通知死者的棋友们，在这些人中间，有著名的职业棋手，也有平凡之辈。他同样准备通知一些交往不多的朋友，因为他们有可能会来参加葬礼。在看到遗书之前，他决定要做第一个参加葬礼的人，可是在遗书读完之后，他什么也不敢确定了。不管怎样，他要送一个栀子花的花圈！也许阿莫乌尔最后曾有过后悔吧。五点钟的时候会举行葬礼，那是炎热季节里最适当的时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从十二点钟就去拉西德斯·奥利贝亚医生的乡间别墅，这位医生是他得意门生，将以丰盛的午餐来庆祝人行二十五年纪念日。

当最初的军队服役的那些狂风暴雨的日子过去之后，乌尔比诺医生成为了一个十分随和的人，他在全省获得了不可比拟的崇敬和威望。每天一早他就起床，开始服用一些药物：提神的溴化钾、治风湿痛的水杨酸盐；治昏厥的黑麦角菌滴剂、治失眠的颠茄。他持之以恒地吃，但总是偷偷地吃，由于在他漫长的行医和授业的生涯中，他向来反对给老人开治标不治本的药剂。对他来说，忍受别人的痛苦要比忍受自己的痛苦容易得多。他衣袋里时刻带着樟脑晶，没有人看见时，他就拿出来偷偷地吸一口，以压制对那么多药



物混在一起的担心。

他平常在书房里背一小时的课，为他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八点钟整到医学院讲授普通临床学作准备，直到临死前为止。他也是个新文学作品的忠实读者，这些作品由他的巴黎书商邮来，或当地书商从巴塞罗那为他订购，即使他对西班牙语文学不像对法语文学那样看重。不管怎样，他从来不在早晨读文学作品，而是在午觉之后读个把小时，在晚上睡觉之前再读一会儿。备课完毕后，他面对打开的窗户，在澡堂里做十五分钟呼吸操。每天他都会面向公鸡啼鸣的方向做操，他向来面向公鸡啼鸣的方向做操，因为新鲜空气是从那儿吹来的。接着他洗澡，修胡子，在真正的意大利香水的浓郁芳香中粘胡子。他穿上白色亚麻衫裤，外加一件坎肩，戴上软帽，穿上西班牙科尔多瓦产的山羊皮靴。直到八十一岁，他仍然保持着在霍乱流行期后不久从巴黎返回时的那种清酒气度和欢乐神情。他的头发居中分开，梳理得一丝不苟，除了颜色变得像金属一般之外，和年轻时一样。他在家用早饭，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一杯大苦艾花汤顺胃，再加一头大蒜。他吃大蒜一向就着面包一瓣瓣细细品味，目的是防止心脏憋闷。上完课后，他往往参加正当的社交活动，或者去接触天主教徒，或者干些艺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某项问题的研究。

▼ 霍乱时期的爱情

他差不多总是在家中吃午饭，饭后一边坐在院里花坛上睡十分钟的觉，一边在梦中听女佣们在枝叶繁茂的芒果树下唱歌，听街上的叫卖声，听港湾里的柴油机和马达的轰鸣声。炎热的下午那种响声在四周飘荡着，就像被判刑的天使在受难一样。然后，他要读一个小时的新书，特别是小说历史专著。接着他便教鹦鹉讲法语和唱歌。很久以来，那只鹦鹉已经成了家中十分吸引人的娱乐品。四点钟，喝下一大杯加冰的柠檬汁之后，他就外出巡诊。虽然他已经上了年纪，他还是不在诊所接待病人，却是向平时一样，到患者家



里去为他们治病。自从市政建设越来越完善以来，他可以乘马车到任何想到的地方去。

他第一次从欧洲回来后，便乘坐由两匹枣骝马拉的家用四轮马车活动。这辆马车坏了，他另换了一辆由独马驾辕的双座四轮带篷马车。当马车逐渐被淘汰时，只有在供旅游观光者观赏和为葬礼拉花圈才使用时，他依然乘坐这种马车，并且还为其古旧的式样感到自豪。虽然他不想退休，但是他心中明白，如果没遇到不治之症，人们是不会上门请他的。他认为那也是一种本领。他只凭表征就可看出患者得的什么病。他越来越不相信药物，对外科手术的推广，他怀有一种恐惧的心情。他说：“手术刀是药物无效的最好证明。”他认为，认真说来，所有的药物都是毒药，百分之七十的普通药物都会使人加速死亡。“不管怎样，”他经常在课堂上讲，“人们已知的良药并不太多，况且只有少数医生真正明白它们的性能。”他从激情澎湃的青年时代开始，就把自己称为宿命论的人文主义者。他说：“一个人的死期都是自己命中注定，我们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时辰一到，就帮助他们既不恐惧又无痛苦地结束生命。”不过，虽然这些偏激的观点已经构成地方医学的组成部分，他往日的学生们，即便是开始正式从是，也还在继续向他请教，因为他们知道他的诊断准确无误。不管怎样，他一直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不可多得的医生，他的病人集中在总督区的高贵门第里。

他平常的工作井井有条，因此假若在他下午出诊期间发生点要紧事儿。他的妻子准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告知他。从年轻时起，他总是要在回家之前到教区的咖啡店里呆一阵子，由此，从岳父的朋友和一些加勒比海难民那里学了一手好棋。然而，从本世纪开始，他不再去光顾教区咖啡店了，而是计划组织由社会俱乐部赞助的全国性比赛活动。就在此时，阿莫乌尔来了，他下肢瘫痪，当时还没有从事儿童摄影工作。三个月以内，他出众的棋艺便使所有的人对



他刮目相看了。他特别擅长走“象”，从来没有输过人一盘棋。而这对乌尔比诺医生来说，不得不认为这是奇迹。当时，他对象棋几乎入了魔，而能使他称心如意的对手已经不多了。

乌尔比诺医生成了他的理所当然的保护人，并且担保他的一切，他甚至没有去调查他的身份，从事何种工作，在什么不光荣的战争中留下一副残废身子而茫然地在此地出现。医生资助给他一笔钱，让他开一家照相馆，而阿莫乌尔，自从使用闪光灯为第一个神色恐惧的孩子照相时起，总是把所有的钱都付给他。

所有的一切源自象棋。最开始，他们在晚饭后七点钟下棋，医生略占上风，因为对手显然也本领高超。后来医生的优势渐渐缩小，最后就势均力敌了。加利莱奥·达孔特先生开办第一家电影院之后阿莫乌尔成了它的最准时到场的观众之一，下棋就只有在没有电影首映式的夜晚了。那时阿莫乌尔和医生已是朝夕相处的朋友，所以医生陪着他去电影院。但医生看电影从不与妻一起去。这一半是因为她不耐烦看那些波澜起伏的情节，另一半也因为医生靠他敏锐的感觉，知道阿莫乌尔不会成为任何人的好伙伴。

到了星期日医生的生活就变样了。他去教堂参加大弥撒，再回到家中休息，或到院里花坛上去看书。如若没有十分紧要的情况，在这个专为自己留用的日子里他很少出诊。多年以来，只有无法推脱，他才接受社会义务。圣灵降临节那天，由于出人意料的巧合，两年离奇的事凑在了一起：一位朋友之死和一位杰出的学生庆祝从业二十五周年。即使这样，他并没有像原先设想的那样的证实了阿莫乌尔的死亡以后直接回家，而是被好奇心牵到了别的地方。

他刚上车，就把遗书急不可耐地再看了一遍。他要车夫把他拉到古老奴隶区的一个难以寻找的地方去。这个命令是如此得不寻常，以致于车夫想确认一下是否有错。没有错，地址很清楚，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写地址的对它十分清楚。乌尔比诺医生重新读起了



遗书的第一页,他又一次沉湎于那些不大受欢迎的大量披露中。如果阿莫乌尔能够使自己相信那些话并非一个绝望者的疯话的话,那么,就算到了他这把年纪,生活也还是可以变化的。

一大早,天空就阴沉沉的,变了颜色,乌云重重,寒风袭人,但是中午之前并没有下雨的预兆。为了抄一条近路,车夫驱车走上了殖民城市铺着石头的凹凸不平的高地,但结果是他必须多次停下来,以使那些参加圣灵降临节礼拜仪式归来的学生和教徒们不让马匹受惊。街上摆着纸花环,乐队奏着乐曲,到处都可以见到鲜花。姑娘们撑着五颜六色的阳伞,头上戴着薄洋纱飘饰,站在阳台上观看节日队伍通过。教堂广场上,在非洲棕榈树和新建的球形路灯之间,几乎看不清美洲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的塑像。弥撒一结束,人们一窝蜂走出教堂,堵塞了汽车出口处,可敬而喧闹的教区咖啡馆里也挤满了人。乌尔比诺医生的马车是惟一的一辆。这辆马车跟城里留下来的其它几辆为数不多的马车大不相同。它的漆皮折叠车篷总是那样明亮耀眼,包角是铜的,目的是不让车腐蚀。轮子和车辕都涂成了红色,金色镶边。这种装扮,使人联想到维也纳上演歌剧的盛装夜晚。除此之外,最爱讲究的家庭往往许可他们的车夫穿上洁净的衬衫,但他却要求车夫穿上软绵绵的天鹅绒制服,戴上马戏团驯兽人的大礼帽。这种衣帽既不合时令,在加勒比海地区的三伏天里,好像缺少一些怜悯之心。

虽然乌尔比诺怪癖似地热爱那个城市,而且比个人都更了解那个城市,但他却绝少有过像那个星期日那样,一无反顾地在那个古老奴隶区的喧闹中冒险。为了找到那个地方,车夫只得绕来绕去,几次停车问路。乌尔比诺医生终于辨认出了附近肮脏阴郁的泥塘,它那不吉利的寂静,它的溺死者的尸体散发出的难闻的恶臭,这种恶臭曾在许多个不眠之夜的黎明跟院子里的茉莉花的芳香混杂在一起飘进他的卧室。他觉得这种恶臭就象昨天的一阵风一样



的从他的身旁吹过，同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当马车开始在街道的泥泞路上颠簸而行的时候，那种被他的思念之情多次理想化了的恶臭就成了一种不可忍受的现实。污泥地上，几只秃鹫在抢食用船锚从屠宰场里的拖出来的下水。与总督区的石砌房子不一样，这里的房子是用陈旧的木材和锌皮搭成的。大多数的房子都建在木桩上，这是为了避免在阴沟涨水时污水涌入。那些阴沟是从西班牙人手中继承下来的。一切都显示出贫困、凄凉的景象。但是，从肮脏的酒店里还是不断地传来贫苦人既不歌颂上帝，也与圣灵降临节戒条的欢快而又响声震天的乐曲不一样。当他们终于找到了目的地时，马车后面已经紧跟着成群的赤身裸体的孩子。他们嘲笑马车夫那一身戏子般的打扮，而马车夫则只得扬鞭抽喝他们，把他们赶走。想要进行一次秘密拜访并且让别人讲出隐私的乌尔比诺医生，有件事他知道得太晚了，这就是没有比他那种年龄的天真更可怕的天真了。

这是一所没有门牌号码的房子，从外衣上看，除了挂着花边”窗帘的窗户和那扇从某个古老教堂拆卸下来的大门外，看不出它和比较贫寒的家庭有什么不同。车夫敲着门环叫门，直到问清地址准确无误后，才把医生扶下车。大门已轻轻打开，黑暗的门洞里站着一位成年妇女。她穿着一身黑衣服，耳朵上插着一朵红玫瑰，尽管已过了四十岁，却依然是一位引人注目的黑白混血女人。她长着一对金色的严肃的眼睛，头发紧紧地贴在头颅上，就象一顶铁丝做成的帽盔。在照相馆里下棋时他曾数次看见她出现在来来往往的许多的美女之中，有一次他还给她开过几袋治间日疟的金鸡纳霜，但此刻乌尔比诺医生并未认出她来。他把手向她伸去，她以双手握住了他的手，说是要跟他打招呼，不如说是引他进去。客厅里摆着芳香迷人的花草，放满了家具和精致的物品，每件东西都有条不紊地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让人心旷神怡。乌尔比诺医生不费吹灰之力



地回想起了巴黎一个古董商的小店，时间是在上个世纪的某个秋天的星期一，地址是蒙特马儿特勒大街二十六号。女人在他对面坐下来，以杂生半熟的西班牙语对他说：

“在这儿您就同在家里一样，医生。”她说，“没想到您来到这样快。”

12 看乱时期的爱情

乌尔比诺医生知道女人已经看出了自己的身份。他认认真真的将她全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注意到她身着重孝，神情悲痛而严肃。他这才明白访问是徒劳，无用的。因为她对阿莫乌尔遗书的详细内容比他知道得更多。事情的确如此。他自杀前的几小时她一直在陪伴着他，就像二十年来她满怀柔情忠诚地陪伴他一样。这件事在这个昏沉沉的省城里无人知晓，虽然在这里连国家机密都瞒不过群众。他们是在波尔特·奥普林塞的慈善医院里认识的。她出生在那儿，而他又是在那儿度过了最早的流亡生涯。一年之后，她随着他来到这儿，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他们想法不尽一致，可是俩人都知道，他将永远留在这儿了。她每星期一次去他那儿打扫卫生和整理工作室，而这就连最爱往坏想的民众都没有把表面现象和事实混在一起，因为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以为阿莫乌尔的残废不只是在行走方面，而这一点，就连乌尔比诺医生从医学的方面也是这样认定的。如果不是阿莫乌尔自己在遗书中揭露了这件事的话，医生也决不会肯定他有一个女人。可是不管怎样，两个互不清楚对方历史的自由的成年人，避开一个保守社会的种种偏见，选择了一条侥幸的默默相爱的道路，这对他来说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她自己解释道她喜欢如此做，再者，那个男人从来没有全部属于过她，她同他偷偷相爱，他们曾多次感受到了刹那间爆炸性的幸福。在她看来，这理所当然；相反，生活已向他们显示，也许这种方式最值得称赞。

前天晚上，他们同去看电影，分别买了票，坐在不连接的座